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

Fertility Policy and Sex Ratio at Birth

● 杨菊华 宋月萍 翟振武 陈 卫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生育政策与 出生性别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杨菊华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1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1111 - 8

I. 生… II. 杨… III. ①计划生育 - 人口政策 - 研究 - 中国 ②人口性别构成 - 研究 - 中国 IV. C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7185 号

·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

著 者 / 杨菊华 宋月萍 翟振武 陈 卫 陈 蓉 陶 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经理 / 邓泳红

责任编辑 / 郑 嫵

责任校对 / 夏 怀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332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111 - 8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杨菊华教授等著的《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是一本典型的人口学著作，本书融合了几位人口学者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读者不难从本书的书名、各章节的标题和作者的学术背景得出这个结论。本书作者翟振武、杨菊华、陈卫等都学贯中西，毕业于我国的名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海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专业专攻人口学，师从名师，并先后取得人口学博士学位。他们人口学研究的基本功都十分扎实，再加上多年人口学教学的实践，他们在人口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们指导并带领学生一道精心研究，获得的成果有很高的可信度。

由于工作需要，我从 1971 年开始从统计学转到人口学，是我国现代人口学开拓者之一，但我并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因为我在美国留学时所在的大学——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没有人口学专业。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那时全球只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专门的人口学研究所。（当时人口学是无人问津的。）作者希望我能为本书写个序，对我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活到老，学到老”，我欣然命笔。

—

本书的出版充分说明人口学是我国社会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门科学。众所周知，科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历史一再证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始终是个重要问题。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取消人口学，漠视人口发展规律，导致人口政策失误是前车之鉴。本书提出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也有人口学的警示作用。

人口学研究的变量大多是微量的，变化幅度不大，但具有积累性和长期性。如果在起始时微小数量失衡又不予重视，到一定时期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数量，一旦如此就积重难返，调整起来非常棘手。我国人口增长造成的困难局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初露端倪，90 年代已十分明显，进入 21 世纪后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进一步加剧，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出生性别比失衡意味着出生男婴数超常地多于女婴，超常量持续积累到婚龄期就意味着男青年大大多于女青年。长此以往，不仅造成男女婚配失衡，还会引发和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导致道德下滑、行为失范、社会不安定等后果，治理起来非常困难，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我国研究出生性别比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关注我国出生性别比的著作、论文也多起来了。不仅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社会评论家等也都参与了该问题的探讨。在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上，我国人口学者理所当然要站在第一线。如果没有人口学从一开始提出研究出生性别比，我国开展这项研究要晚得多，出生性别比在其他学科不易察觉，也不如人口学敏感。本书的出版也是顺应形势的要求，把最新研究成果与全社会共享。

二

本书的命题体现出人口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朝阳科学。在人口学的萌芽时期，人们多认为人类对生育是不能干预的，生男生女是“命中注定”。那个时代对出生性别比这个变量并不关注，就是到人口学蓬勃发展的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也局限于研究出生的时间、地区、国家、民族、种族、胎次、母亲年龄、活胎和死胎、合法婚姻与非婚生育等造成的出生性别比的比值、差别和趋势。那时，全球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如无特殊情况，人类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是相对稳定的，公认的男女出生性别比是 105:100，男婴的比例在 103~107 范围内波动。对此，人口学家都习以为常，认为出生性别比研究无关宏旨，把出生性别比和人口性别比混为一谈的学者也不罕见。

随着世界人口激增，全球控制人口和人类对生育行为的干预被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一些传统重男轻女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过程中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有更多、更新的研究，探讨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后果，推动人口学的发展。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浮出水面，这进一步促进了出生性别比研究工作的开展。随着生育、节育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生育行为普遍受到干预，加上现代超声波技术的普及，容易获得怀孕期胎儿性别的信息，造成有些人在生育上传统固有的男性偏好顽强地表现出来。为了对症下药，在客观上就要求从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生育政策等角度研究出生性别比，而不像过去只从生物学角度和人口学角度研究出生性别比。本书题为《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正是人口学一向与时俱进的体现。几位学者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胎次一激化双重效应”理论，并在该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2000 年全国各地区的政策生育率数据，结合实地调研资料，深入挖掘了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独立关系。全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相互补足，并将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置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技术进步的宏观环境中，对生育政策在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提出了新的研究发现与成果。可以说，本书既有理论创新，也有方法创新。

三

本书作者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和 21 世纪后直接接受和传播现代人口学知识的学者；本书的写作体现出现代社会科学定量化和信息技术化的趋势。本书使用大量的数据和图表，说明了“人口学本质是一门数量科学”^①。在社会科学中，人口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本书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表明人口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认识社会现象的功能，即确定事实、对各种价值判断提供实证和预测功能等。

用数据来确认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不同于仅用思辨和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描述出生性别比高低或增幅大小；而且，本书使用的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或各种专门调查的数据等都是权威部门精心组织、严格收集的数据。当

^① 引自《大英百科全书》。

然，人口作为社会现象也不可能像在实验室中那样，不受人为了干预。本书涉及的是敏感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数据失真（如瞒报、漏报、登记误差、抽样误差等）难以完全避免。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人口学界一度对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究竟是真失衡还是假失衡展开过热烈的争论，这也充分说明在人口数据上确定事实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本书作者已作过数据质量检验，也用其他部门的统计资料 and 人口统计技术方法进行过校正，大大提高了数据和结论的可信度。

人口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出生性别比必须有价值判断。对其失衡的原因，学者都认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进一步的价值判断孰轻孰重，直接或间接，深层或浅层，必然见仁见智，甚至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价值判断更需要立足于确凿的事实。肯定了“是什么”，才有可能提出“为什么”和“怎么办？但“为什么”和“怎么办”都需要足够的事实来论证。本书按生育政策的地域考察出生性别比的差异，对研究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研究是个有说服力的论据之一。

人口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预见功能，在出生性别比研究上更为重要。因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体现在今后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及其规模上。不断监测和预见这一变化，是人口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科学职能，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邬沧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编者的话

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步步走向失衡，21世纪初的形势尤为严峻。其延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失衡的程度之深、影响的后果之严重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生育政策推行之后，故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了政府、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专门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还为数不多，不同学者的看法也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学者普遍认为，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无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二者关系的深入研究也被提上了日程。

本书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次实地调研的思考和总结，构建了阐释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的“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翔实的数据资料，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视角深入分析了现行的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之间的关系，详细探讨了政策作用于出生性别比的显性和潜在机制，简明阐述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经济、人口后果，并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遏制出生性别比继续攀升的初步政策思考和建议。

本书是福特基金会资助课题（项目号：No. 1085-0180）“生育政策的性别特征与出生性别比”（Local Variations of Birth Planning Policy an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及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研究”（项目号：08JZDH0025）课题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虽然书稿的每一章分别由不同成员负责，但在项目实施、数据分析和书稿准备的过程中，课题组多次召开研讨会，通告课题的进展情况，安排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对文献研究、数据分析、调研访谈的整理结果进行深入剖析，集体磋商，邮件往来更是数不胜数。

书稿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由翟振武、陶涛承担；第二章由陈卫承担；第三章和第八章由杨菊华、陈蓉承担；第四章和第九章由杨菊华承担，第五、六、七章由宋月萍承担。全书最后由杨菊华统稿。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多次深入项目实验点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2007年11月：与湖北省鄂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联系、商谈项目实验点事宜。

2008年4月：项目启动会前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举行，至此“生育政策的性别特征与出生性别比”项目正式开始实施。同时，课题组成员在项目点开展了首次深度访谈，收集了实验地点的相关文献资料。

2008年9月：项目第二次调研。调研过程历时数天，在这期间，课题组成员与当地群众建立了相互信任、彼此友好的互动关系。调研组另辟蹊径，首先请当地群众历数村庄最近几年生育的男孩、女孩数，然后通过入户访谈和实地观察获得深入、真实的资料。

2009年4月：项目第三次调研。在前几次调研活动的基础之上，本次调研综合使用了入户个案访谈、群众焦点组座谈、计划生育干部焦点组座谈、实地观察等方法收集资料，而且还发动当地群众积极主动参与调查，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成为调研活动的一分子。

为加强学术交流，扩大项目的影响，引起社会和学者对本研究的关注和了解，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

《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人口与发展论坛”以“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吗”为题展开讨论。本次论坛由杨菊华主持，邀请陈卫、宋月萍、陶涛、陈蓉等课题组成员，以及杨成钢、蔡菲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客观的学术交流、磋商与探讨。

《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3期发表了课题组成员《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学术论文。

《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4期发表了课题组成员《胎次一激化双重效应：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学术论文。

此外，课题组成员在多个场合宣讲课题的研究成果。比如，2009年3月，课题组成员在“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讨会——近期研究成果与未来研究方向”论坛上宣读了“胎次一激化双重效应：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理论研究 with 实证分析”；2009年，在四年一度的国际人口学联盟

(IUSSP)大会上宣讲“Local Variations of Birth Planning Policy an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更多的相关成果将相继呈现给广大的读者。

课题组成员还应邀为中国教育电视台“女性世界”栏目介绍中国“关爱女孩行动”与出生性别比专题节目,也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外交流节目介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趋势、特点、成因与后果等,同时介绍了本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进一步加强了对外交流,扩大了项目的影响。

作为项目成果的一部分,课题组分别向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鄂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了相关研究报告,将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向项目点的主管单位进行了汇报,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缓解出生性别比的初步政策思考和建议。

本项目成功实施和发表,需要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帮助。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给予我们的课题热情的关注和支持,请允许我们向项目官员李文晶女士及其助手施雪华女士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原司长张二力毫无保留地提供2000年政策生育率数据以及在项目申请和实施过程中的鼓励和支持。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鄂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两任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鄂州市华容区相关领导多次不厌其烦地组织、安排、帮助项目调研活动的开展与实施,并提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将难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真实的资料,本项目的实践活动不可能顺利完成。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相关领导还专门到项目点视察,表示对项目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邬沧萍先生欣然提笔为本书作序,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云彦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苗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友华教授给予本书的精辟点评。此外,周祝平博士和陈志光(博士在读)参与了课题项目点的调研和数据整理,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们要感谢长期以来致力于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邓泳红女士及郑嫵编辑,她们高效率、高质量的工作,使得本书可以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09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导 言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现存研究的局限	2
三 研究目标与目的	4
四 数据与方法	6
五 研究意义	8
六 本书的结构	9
第一章 近 30 年来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宏观背景	12
第一节 经济转轨	12
第二节 社会转型	16
第三节 文化制度	23
第四节 人口转变	28
第五节 生育政策	31
第六节 技术进步	37
第七节 政府干预	39
本章小结	43
第二章 出生性别比的趋势与特点	45
第一节 出生性别比的水平与趋势	46
第二节 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55
第三节 按生育政策类型区分的出生性别比	67
本章小结	71

第三章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文献综述	74
第一节 经济转型与出生性别比	74
第二节 文化传统与出生性别比	81
第三节 生育政策、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	89
第四节 技术的可及性与出生性别比	93
第五节 其他因素与出生性别比	98
本章小结	103
第四章 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设	105
第一节 现存相关理论简介	106
第二节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建构	118
第三节 理论假设	128
本章小结	131
第五章 数据、方法及描述性分析	133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33
第二节 变量的定义与操作	13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49
第四节 单变量描述性分析	151
本章小结	164
第六章 宏观层面分析结果	166
第一节 政策生育率与出生/儿童性别结构的相关关系分析	166
第二节 政策生育率与出生/儿童性别结构的模型分析结果	171
本章小结	182
第七章 个人层面分析结果	184
第一节 政策生育率与出生/儿童性别结构的相关关系分析	184
第二节 政策生育率与出生/儿童性别结构的模型分析结果	190
本章小结	209

第八章 定性资料分析	210
第一节 调研背景介绍	210
第二节 生育意愿	218
第三节 男孩偏好存在的原因及实现的途径	227
第四节 人们对一孩半生育政策的解读和评价	237
第五节 人们对性别比失衡后果的认知	240
本章小结	242
第九章 总结、思考与对策建议	244
第一节 主要分析结果总结	245
第二节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	255
第三节 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政策思考	262
结 语	278
参考文献	280

导 言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人口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每 100 活产女婴，对应着 103 ~ 107 活产男婴（即 105 ± 2 ），这是漫长岁月自然进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虽然出生的活产男婴多于女婴，但由于男婴和男性青少年的死亡率高于同龄女性的死亡率，结婚年龄段的人口性别结构大体持平；若出生性别比持续超过 107，则是很不正常的社会人口现象，是人为地进行胎儿性别选择的结果。

国内外研究表明，在具有男孩偏好的环境中，出生性别比失衡是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经济转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近 30 年来，中国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迅速、持续攀高的现象。数据显示，在 1982 ~ 2007 年间，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从 107 上升到 120 以上，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正常值范围。尽管自 1980 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府就开始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及旨在改善女孩生命、生存及发展机会的项目活动，力图遏制出生性别比严重攀升的势头，但效果并不明显，至今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在继续升高，没有扭转的迹象。中国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出生性别比持续异常的国家，一些处于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发生过（韩国、我国的台湾省）或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印度、越南等）。然而，作为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延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失常的程度之深、对社会发展与稳定造成的后果之严重，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拟的。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个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的国家之一。这些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及中国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出生性别比是整个人口性别结构的起点。该比例一旦失常,难以逆转,其后果纵贯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横穿各级社会组织单元,是多维度并且与其他现象交织在一起的。它不仅直接导致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异常,而且会影响婚龄人口,传递到老年人口,使整个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衡。一方面,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直接反映了部分女胎的生命权被剥夺;而生命机会和生存机会是个体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性别差异比这个差异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它将打破婚龄期人口性别结构的平衡;而潜在的婚龄人口失调将会对未来的婚姻市场造成挤压,产生大量的非意愿性独身男子(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然而,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严重后果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孕育阶段,它带给社会的也不仅仅是婚姻挤压现象,它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异常深刻和极其久远的,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健康等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个体、家庭、社区、地区以至整个国家,甚至可能波及全球。人口性别失衡将会导致或加深婚外性行为蔓延、地下色情业泛滥、拐卖妇女严禁不止等负面社会现象,使青年妇女成为直接的受害者。这将直接增大家庭和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风险系数,进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威胁社会安全。它也会制约人口健康素质提高,对大量个体的生理、心理以至寿命产生不利影响,增大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的压力。它还将影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使社会面临新变化和新需求的巨大挑战,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可见,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威胁人口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负面影响的长期存在和相互交织,将使我国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在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直接威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因此,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是中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一个事关全局、事关未来、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资参照,也没有公认的理论予以说明和阐释。该局面对学界提出挑战,呼唤学者直面并深入探讨该问题,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将对整个人类作出贡献。

二 现存研究的局限

大量研究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医学等多个视角探讨了出生

性别比失衡的现状、成因及后果。概而言之,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被归为女婴漏报和女胎流产,其潜在机制则是基于经济制度、文化惯习、家族制度的性别偏好,而生育政策是架起直接原因与潜在机制的桥梁之一。这些研究不乏创新见解,逐渐深化、拓展了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出生性别比现状和原因的认识,也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现存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就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总体情况来看,现存研究存在四多、四少、二不清现象:(1)从研究内容来看,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状与特点进行描述的多,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实证分析的较少;(2)从研究方法来看,单独采用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的多,将二者有机结合的较少;(3)从研究理论来看,抽象的理论分析或单纯的数字罗列较多,运用合适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较少;(4)从研究视角来看,从宏观视角研究的多,包括个体、家庭等多层面研究的少。因此,现存研究比较零散,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系统性研究的不足一方面使许多重要的问题未能得到厘清,包括现在的出生性别比究竟是多少、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因素在其失衡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等等;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我们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潜在后果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使政府、学界、民众、甚至部分基层单位的政府官员对该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清,从而使该问题未能得到及时且有效治理和缓解。

其二,就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来看,现存研究尚显不足,实证研究尤其欠缺。尽管学界对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已基本达成共识,但由于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故学界对此要么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要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文献检索和梳理的结果显示,与浩如烟海的出生性别比研究相比,直接探讨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研究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依旧处于“犹抱琵琶半掩面”、千呼万唤尚不明的境地。该现象既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也不利于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这些分歧来自多种因素,包括(1)政策数据多不可得,人们难以从实证角度检验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2)政策作用于出生性别比的理论连接不明;(3)二者的关系受制于其他因素,其独立关系难以剥离;(4)与生育率相比,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时间并不长。的确,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更为复杂,故对该问题

认识的不足十分正常。然而，它们的关系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厘清政策与出生性别比之间是否相关、怎样相关、为何相关等问题对于解决困扰学界的这一难题，对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和学术意义。

三 研究目标与目的

本书的目标有三：

其一，厘清关系、澄清认识。我们探讨生育政策（尤其是一孩半生育政策的性别短视特征）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独立关系：它们是否存在关系、存在怎样的关系、为什么存在关系，等等，回答生育政策本身及其地区差异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等问题。我们将通过对数个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的分析，用事实证明，一孩半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是其他研究不曾做过的工作，虽然许多学者都涉及该问题。该目标旨在回答“是什么”，并为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提供科学依据。

其二，阐释原因、解读机制。在模型分析厘清二者关系“是什么”的基础上，我们整合定性访谈资料来探索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和机制，理解一般群众对生育政策的解读，分析人们的生育意愿，探究男孩偏好存在和延续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原因，以此来回答生育政策（尤其是政策的性别短视特征）与出生性别比（尤其是分胎次的出生性别比）之间“为什么”存在关系。

其三，探寻途径、提出对策。在回答了“为什么”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索降低出生性别比、形成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的可行性措施，探寻消除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的可行途径，为完善未来的生育政策、缓解出生性别比提供实证参考依据。该目标旨在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比如，如何调整政策、在多大范围内调整政策，等等。

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其他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我们通过区分政策的地区差异，突出政策的性别含义，澄清政策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联及其机制和程度。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层次的诸多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显性影响和潜在作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我们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考察出生性别比：（1）宏观层次（全国和分省区）的出生性别比；（2）微观层次的个体生育行为。具